

民族國家視野中“新人”誕生的艱難

——兼論《傷逝》的“五四”意義

張 娟

摘要：如果說當代世界的基本政治單位“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的話，在《傷逝》中我們體會到這種被民族國家的想像召喚而出的力量，雖然這一召喚是模糊的。本文嘗試從這一視角重讀《傷逝》，探討涓生是怎樣在“世界”和“西方”的文學經驗下開始自己走向“新的生路”的努力，傳統解讀中置於中心位置的愛情故事實質只是涓生探討新生的一條道路，這條道路失敗之後，涓生並沒有停下來，而是帶着傳統和道德的重負繼續前行，但是在當時民族國家生成的世界圖景下，無論是思想啟蒙的涓生，還是生活啟蒙的子君，去往新的生路是注定失敗的。魯迅在小說中用自我質疑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反思和困惑，這也提示我們在空間的世界圖景下重新反思“五四”的意義，除了探索“新人”在歷史中的意義，五四的另一重意義是探討“新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可以說五四時期，在民族國家體系建構的過程中，文學最大限度地參與了時代的建構。

關鍵詞：魯迅；民族國家想像；“新人”的誕生；五四反思

《傷逝》是一個具有魅惑性的意義交纏的文本，也是在魯迅的單篇小說中被反復閱讀闡釋最多的文本之一。綜觀《傷逝》研究話語，文本審美形式的探討有複調說，審美距離說，音樂性，抒情話語等研究，從思想內涵角度解讀的更是蔚為大觀。迄今為止有周作人的紀念“兄弟”之情之說，《娜拉出走以後怎樣》的女性解

放問題形象化解答之說，有知識份子啟蒙說，有從性別視角的男性對女性話語的遮蔽中探討男性中心傾向說。在《傷逝》閱讀史中，從對涓生的啟蒙知識份子形象探討到涓生的男性話語對女性話語的遮蔽這一潛在的脈絡。有齊宏偉《〈傷逝〉新解》認為魯迅“把愛情與個體精神成長聯繫起來，具有審美階段-倫理階段-宗教階段的痕跡”，林丹婭《“私奔”套中的魯迅：〈傷逝〉之辨疑》認為本文蘊含着“中國現代男性文化精英的性政治觀、話語類型、兩性關係與女性解放進程的真實形態”，程亞麗《“人必生活着，愛才有所附麗”——〈傷逝〉中子君身體敘事的多重解讀》認為魯迅“借助傳統故事敘事的現代轉型”，“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製造的似乎堅不可摧的現代啟蒙神話。”在筆者的拙文《知識、日常、身體的權力制衡——魯迅對早期中國市民社會知識女性命運的探討》中也探討了《傷逝》可以看做魯迅對走入城市的娜拉命運的邏輯推演，但是在閱讀《傷逝》的過程中，筆者又深刻感受到從性別角度探討涓生的強勢的男性話語從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不公平的權力話語，忽略了在民族國家視野中正在誕生的“新人”的必要同情，從“新人”這一角度來講，涓生和子君都是剛剛從傳統帝制和農業文明中走出來的一代“新人”，他們對於自己的未來、民族的出路認識都不是特別清晰，他們做出了戰鬥的姿態，邁出了去往新路的步伐，也做出自己所能做出的最大的犧牲，他們沒有實質性地找到自己的道路，不是個體的原因，而是整個中國社會還沒有做好準備迎接這全新一代的過程，他們作為歷史的“中間物”，向我們展示了“新人”誕生的艱難。

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中通過現代小說挖掘文學背後的民族國家的想像，把中國作為第三世界的範例分析國家想像的方式，認為國家（nation）是“作為影像被心靈世界描繪出來的想像性的政治共同體”，並把民族主義和印刷資本主義的關係歸結為三點，認為“世俗的、

特殊的和‘可見之不可見’當中，形成了民族的想像的共同體的胚胎。”¹美國學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在《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中認為第三世界的文學與第一世界的文化有關，帝國主義強行納入第三世界後，第三世界的文學想像會受到牽連。事實上，中國文學也是在這一背景下建構起了自己的民族國家想像。之後，海外內學者在民族國家視角下產生了一系列成果。海外華裔學者李歐梵在《鐵屋中的吶喊》中論述魯迅的文學和政治的關聯，闡釋其關於“人國”的想像以及翻譯作品中革命的想像。王德威《想像中國的方法》以小說史的研究為物件，通過魯迅對文學史的研究，構建其背後蘊含的國家想像，劉禾《文本、批評與民族國家文學》界定了民族國家文學的內涵，並對詹姆遜民族寓言式的魯迅解讀方法表示了懷疑。國內學者中，董炳月《“仙台魯迅”與國民國家想像——以仙台書簡為中心》，通過梳理魯迅在仙台時期的學習、生活狀況和閱讀體驗，探討魯迅思想的演變和國民意識和國家意識的想像。符傑祥《魯迅留日時期“現代”思想的發生與形成》，通過魯迅留日時期的現代性體驗和其文學作品中體現的國家想像，尋找其現代思想的根源。高宏存的《“破家立國”的現代追尋——由魯迅、老舍、錢鍾書說起》，分析三人“破家立國”的共性。何雪雁《翻譯·想像·歷史——翻譯對中國形象的想像和建構》通過對比分析魯迅、嚴復等作家的翻譯，探討中國形象和救國思想。侯運華《抨擊與憧憬：晚清小說中的民族國家想像——以晚清譴責小說、翻新小說、科學小說為主》，以晚清小說為切入點，研究晚清小說中的民族國家想像，思考國家的生存方式。²這些成果都從民族國家角度提供了對五四文學反思的新視角，本文嘗試從這一視角重讀《傷逝》，探討涓生是怎樣在“世界”和“西方”的文學經驗下開始自己走向“新的生路”的努力，傳統解讀中置於中心位置的愛情故事實質只是涓生探討新生的一條道路，這條道路失敗之後，涓生並沒有停下來，而是帶着傳統和道德的重負繼續前行，但是在當時民族國家生成的世界圖景下，無論是思想啟蒙的涓生，還是生活啟蒙的子君，去往新的生路是注定失敗的。魯迅在小說中用自我質疑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反思和困惑，這也提示我們在空間的世界圖景下重新反思“五四”的意義，除了探索“新人”在歷史中的意義，五四的另一重意義是探討“新人”在世界中的位置。

¹[美國]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3頁。

²其他相關的論文還有：趙亮《海外體驗與現代中國文學的發生》，梳理和分析魯迅留日時期的文學觀及其構造的國家想像。曠新年的《民族國家想像與中國現代文學》（《文學評論》2003年第1期），耿傳明的《中國近現代文學中的民族國家敘事與文化認同》（《齊魯學刊》2002年第3期），倪偉《民族想像與國家統制：1928-1948南京政府的文藝政策及文藝運動》（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文學在建構民族國家的同時，也對民族國家進行了越界和提問。

一、“寂靜和空虛”與“新的生路”

在“世界”和“西方”的背景下，涓生要往何處去？這是《傷逝》討論的主旨，小說看起來是一個愛情小說，但是如果仔細研讀，會發現愛情的開始是為了逃避“寂靜和空虛”，愛情結束的時候又回到了“寂靜和空虛”。這是一部想要逃離“寂靜和空虛”，尋找“新的生路”的小說，愛情只是涓生嘗試的一種逃離的手段，最終小說指向的依然是對“新的生路”的追尋和嚮往。

《傷逝》中有一處非常值得探究的“症候”，就是“寂靜和空虛”的反復出現。在文中“寂靜和空虛”的出現有三種情況，首先是在文中的開始部分集中出現，形成了從借着愛情逃離“寂寞和空虛”到愛情失敗又重回“寂靜和空虛”的螺旋式上升結構。“會館裏的被遺忘在偏僻裏的破屋是這樣地寂靜和空虛。時光過得真快，我愛子君，仗着她逃出這寂靜和空虛，已經滿一年了。”在一些研究者的解讀中，認為“子君是‘我’生活的力量與獲得勇氣的源泉，是因為有她，‘我’的生活才逃離了寂靜與空虛！這是愛情的生發！”³但在這句中的“仗着”一詞，提示了子君只是涓生逃離“寂靜和空虛”的一個由頭，對涓生而言，逃避“寂靜和空虛”的願望要遠甚於對子君的愛。“在一年之前，這寂靜和空虛是並不這樣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來。”接下來的這兩句中，同樣是“寂寞和空虛”，但意義卻截然不同，當時的“寂靜和空虛”是不知道該如何走向前路，而期待着用愛

³張賽賢：《〈傷逝〉的另類解讀——以“寂靜”、“空虛”為例》，《寫作》2008年第4期。

情來拯救自己，在涓生的世界裏，這個“愛情”又被賦予了“民族”、“革命”、“解放”、“自由”的意義。其次，在涓生和子君逐漸產生了“隔膜”，試圖暗示子君離開以開闢新的生路時，“空虛”大量出現，此處的空虛指向的是真實與謊言的辯證關係；第三次集中出現是在子君離開後，輪回般的“寂寞和空虛”再次出現，愛情的嘗試失敗，新的生路還未開始，涓生又回到了原地，但這是“真實”換來的“虛空”，意味着愛情替代革命的失敗，涓生只能將真實藏在心的創傷中，用遺忘和說謊做他的前導，向着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

涓生竭力想要跨出的“新的生路”到底是什麼？在文中有沒有給出提示？事實上，在文中也有“症候”出現。整篇小說都瀰漫着沉重的悲哀的氣息，如同一個巨大的黑洞，將人帶入無限的空虛，結構複雜的沉悶的長句使得小說像一個綿長的歎息，但是文章有三處想像，意外地採用了語氣輕快、節奏感強的短句，連續的排比傳達出一種自由的氣息和新生的喜悅。而這三處想像，正體現了一種民族想像共同體的建構，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和社會的關聯，我與世界的同在是通過想像的方式構建的。

第一處想像出現在涓生和子君的隔膜越來越深重的時候，涓生選擇了到通俗圖書館讀書，在這個公共空間，他獲得了少有的輕鬆感。“屋子和讀者漸漸消失了，我看見怒濤中的漁夫，戰壕中的兵士，摩托車中的貴人，洋場上的投機家，深山密林中的豪傑，講臺上的教授，昏夜的運動者和深夜的偷兒……。”這是一個廣闊的社會圖景，正如魯迅所言“熟識的牆壁，壁端的稜線，熟識的書堆，堆邊的未訂的畫集，外面的進行着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⁴涓生想要離開子君，不是因為愛上了別的女人，而是因為他有着更深廣的理想和追求，他以知識份子的

⁴魯迅：《這也是生活》，《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601頁。

情懷與這個世界休戚與共，從農民階級的漁夫，到戰壕中的士兵，從汽車中的富人，到洋場上的金融家，從深山中的英雄豪傑，到學院派的教授，從夜裏的運動者到小偷，這就是整個社會的全景圖，涓生不是一個簡單的愛情故事的男主角，他是一個啟蒙思想者，他覺得自己對世界負有責任。

第二處想像出現在涓生和子君說了分手之後，雖然分手對於子君來說，猶如滅頂之災。而涓生也不是不知道這些話的效力，否則他便不會感覺“時時疑心有一個隱形的壞孩子，在背後惡意地刻毒地學舌。”但是，他終究還是選擇說出來，為了“新的路的開闢，新的生活的再造，為的是免得一同滅亡。”而且涓生一廂情願地想像子君終於可以覺悟，並勇敢開啟自己新生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新生之路也不是新的愛情，而是同樣寬廣的社會的圖景：“在通俗圖書館裏往往瞥見一閃的光明，新的生路橫在前面。她勇猛地覺悟了，毅然走出這冰冷的家，而且，——毫無怨恨的神色。我便輕如行雲，漂浮空際，上有蔚藍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廣廈高樓，戰場，摩托車，洋場，公館，晴明的鬧市，黑暗的夜……。而且，真的，我預感得這新生面便要來到了。”在涓生的想像中，已經走出了“父權”的家的子君，此時又走出“夫權”的家，而涓生便可以在不同的空間，不同的時間自由行走，走向廣闊天地。

第三處想像是子君離家，留下了“生活材料的全副”，涓生被房屋的空虛和隱忍的子君所壓迫，艱於呼吸視聽、“我似乎被周圍所排擠，奔到院子中間，有昏黑在我的周圍；正屋的紙窗上映出明亮的燈光，他們正在逗着孩子推笑。我的心也沉靜下來，覺得在沉重的迫壓中，漸漸隱約地現出脫走的路徑：深山大澤，洋場，電燈下的盛筵；壕溝，最黑最黑的深夜，利刃的一擊，毫無聲響的腳步……”無法面對當下涓生的同樣依靠想像建構自己的新生，而其建構的世界讓我們想到魯迅的一

篇散文《這樣的戰士》“他走進無物之陣，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他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正如炮彈一般，使猛士無所用其力。”⁵不管敵人怎樣強大，怎樣的無物之陣，他都一次又一次舉起投槍。這樣的戰士就是“最黑最黑的深夜裏”那“利刃的一擊”，而戰鬥的場景同樣涵蓋了從農村（深山大澤）到洋場（城市），從室內（電燈下的盛筵）到室外（壕溝）。

安德森對“民族”這個概念給出了一個富於想像力的定義：“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⁶“它是想像的，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員，也不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和他們相遇，或者甚至聽說過他們，然而，他們相互聯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⁷涓生對於“新的生路”的想像，就是和“無盡的人們，無窮的遠方”聯繫在一起的，他並不認識，也沒有相遇，但是他卻覺得自己的命運與他們有關，自己的奮鬥是為他們才有意義。

有意味的是，涓生的想像是革命的，又是虛妄的，這個想像是有點模糊的，充滿豪情，但似乎又很難找到實現理想的道路。這種無力感實質上和魯迅在《故鄉》中呈現出來的“啟蒙缺席空場”一樣，邱煥星在《再造故鄉》中談到：這正反映了清末民初一代中國知識份子“新人”誕生的艱難，涓生的境遇就是這一代知識份子的尷尬處境。清末民初，中國知識份子面對着國家巨變，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

⁵魯迅：《這樣的戰士》，《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19頁。

⁶[美國]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導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頁。

⁷[美國]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導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頁。

傳統文人通過科舉進入政治權力中心的道路從此關閉。清廷的新政導致了傳統士紳階級的沒落和宗族學堂的消失，傳統文化出現斷層，大量知識份子湧向城市，接受新式教育。《傷逝》小說開篇的時候，涓生居住在紹興會館，這個紹興會館建于清道光六年，主要接待山陰、會稽兩縣趕考的舉人，當魯迅來到這裏的時候，科舉制已經廢棄了。而在科舉正式廢止之前，魯迅已於 1898 年閏三月，考入南京的江南水師學堂，1902 年 2 月，由江南督練公所派赴日本留學。1912 年，魯迅作為一個外省青年來到北京，就落腳在這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會館，在民國政府教育部掛着閒職，整日靠抄寫殘碑拓片消磨時光。魯迅在紹興會館裏經歷過漫長的沉默期，用竹內好的話來說，就是“醞釀着吶喊的凝重的沉默”，並在沉默中有“回心”式的覺悟，而這一期間“寂寞、沉默是‘重’的，‘回心’式的覺悟則是‘輕’的”⁸這種輕與重，和涓生是一樣的。晚清的中國，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舊的社會秩序土崩瓦解，知識份子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姿態，參與到救亡圖存的社會運動中去，他們希望對中國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文化體制進行改造。但是，最終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將天下縮變為“國家”，並試圖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 19 世紀為國家尋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是這一代知識份子的宿命，也是他們的擔當，但當時的時局並未帶給他們方向。在《傷逝》中的表徵，就是關於新生道路的不甚清晰的想像，而這個想像是如何發生的，正是我們接下來需要討論的問題。

⁸劉超：《紹興會館裏魯迅內在精神的重與輕》，《書屋》2016 年第 3 期，第 24 頁。

二、“世界”和“西方”的文學經驗

二十世紀早期，中國城市社會形成的過程中，閉關鎖國的中國逐步進入世界語境。不可否認的是，在五四時期崛起的一代作家的寫作中，“世界”和“西方”成為一個重要的參照標準，這一時期以“五四”為核心的對民族自我的懷疑和否定形成了對“世界”、“西方”、“他者”觀念的服膺，“五四”時期“沉默的大多數”的民族形象表徵和對“國民性”的批判否定，都是在西方的參照下進行的。

“五四”知識份子在顛覆自我中心的同時，不但沒有緩解“新人”誕生的焦慮，反而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焦慮感。劉禾認為：“‘五四’以來被稱為‘現代文學’的東西其實是一種民族國家文學。”⁹民族國家是研究現代文學乃至 20 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角度。受到傑姆遜“民族寓言”和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影響，中國研究者展開了一系列的研究。

《傷逝》的開篇：“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¹⁰這個句式非常的拗口，和中國式的表達截然不同，但如果翻譯成英文，卻極其流利：“If I can, I would write down my regret and sorrow, for Zi Jun, for myself.”這種受西方翻譯腔影響的話語模式在《傷逝》中表現的極為明顯，“世界”和“西方”的文學經驗，正是涓生的知識背景。

五四時期的知識份子生活在什麼樣的媒介環境之中呢？郁達夫在《沉淪》中不厭其煩地講述自己正在閱讀的書和正在翻譯的詩歌，其實也是寫作的文學資源的一

⁹劉禾：《文本、批評與民族國家文學》，《語際書寫——現代思想史寫作批判綱要》，上海三聯書店，1999 年第 191 頁。

¹⁰魯迅：《傷逝》，《魯迅全集》（第 2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第 114 頁。（以下《傷逝》引文均出自此版本，恕不贅註）。

種表達，在《傷逝》中作者很少談到自己正在閱讀什麼書，內向的靈魂獨白也使得小說很少描寫周圍的文化環境。但是這個無處不在的文化範圍依然在小說中是有跡可循的。涓生和子君戀愛的時候，涓生給子君侃侃而談的是家庭專制、打破舊習慣、男女平等，他傳授給子君的主要是易蔔生、泰戈爾、雪萊，牆上釘着的也是雪萊的半身像。涓生的工作是小公務員，當他失業以後，他選擇的謀生方式是給《自由之友》寫稿，當他勸說子君離開的時候，談到的外國文人的作品主要是易蔔生的《諾拉》和《海的女人》。

安德森提出了三種前提對於想像民族的可能性出現的意義，第一是語言，提供了通往本體論真理的特權途徑，第二是相信社會是自然而然地存在於至高的中心和層級的組織的，第三是時間性的概念，並特別指出了印刷資本主義時代越來越多的人用深刻的新方式來對自身進行思考，並且將自身和他人關聯起來。其中對中國的早期現代化進程起到重要作用的就是語言的變革和加入世界性的時間概念。具體說來就是白話文的使用和印刷資本主義中自身和世界關聯的建立。

語言是“想像共同體”的形成要素。早期魯迅依然用文言寫作和翻譯，試圖用文言來傳達新質的精神，他訴諸傳統資源，在魏晉文化中尋找力量。在當時的文化語境中，文言是精英、貴族的語言，而白話是引車賣漿之流的日常語言。《狂人日記》用白話取代文言，有多種原因，城市化進程中語言是“想像共同體”形成的過程中必須推翻的壁壘，語言變革是思想啟蒙的前提，魯迅的老師章太炎也積極加入了白話革命。魯迅認為，中國言文不一致的原因就在於字難寫，即使是流傳至今的文字“已經並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諧聲的諧聲字。”¹¹這些古文字已經無法真實記錄古代，也無法記載現代。其次，中國的文法不精密，無法有精密的文章和

¹¹魯迅：《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94頁。

清晰的頭腦。第三他指出了中國文字的等級性和階級性，在當下文壇，“左翼作家之中，還沒有農工出身的作家。”¹²實際上，五四時期的白話是在“舊白話的基礎上，吸收其他各種語言成分形成的一種語體。”而這種夾雜着外文單詞，由日文、英文、德文混合在一起，表現着新的思想和道德的話語詞彙最終也成為了五四精英的話語方式，樹立了西化的權威。通過小說和報紙發聲，才能為“重現民族這種想像的共同體，提供了技術上的手段。”¹³

安德森在強調了同時性（**simultaneity**）這個概念對於民族的想像共同體的重要性，“這個概念把時間看成很接近本雅明所說的‘彌賽亞時間’，一種過去和未來彙聚於瞬息即逝的現在的同時性”。¹⁴時間觀念的改變對於我們理解“新人”的誕生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標誌着對世界理解方式的革命性的變化。“在神聖的共同體、語言和血統衰退的同時，人們理解世界的方式，正在發生根本的變化。這個變化，才是讓‘思考’民族這個行為變得可能的最重要因素”。¹⁵正如梁啟超在旅美日記中開始使用西曆紀年的方式，放棄了中國傳統的農曆標記方式，就是向世界性的同一性的時間轉化的標誌。傳統中國基於農業生產方式的靜止的直線的時間觀念在《傷逝》中開始發生了

¹²魯迅：《二心集·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95頁。

¹³[美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3頁。

¹⁴[美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3頁。

¹⁵[美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頁。

改變，除了顯而易見的春夏秋冬與感情發展相對應的顯性的線索外，小說中敘述者的聲音和主人公的聲音同時並置，形成了時間的“同時性”（simultaneity）向度。

英國商人 1868 年在上海創辦了華文報紙《上海新報》，1872 年上海出版《申報》，他們都拿出部分版面刊載詩詞，成為報紙“副刊”的起源。五四時期，副刊成為單獨印刷的文化版，北京的《晨報》副刊、《京報》副刊、上海《民國日報》、《時事新報》兩家報紙的副刊《覺悟》和《學燈》，被稱為“四大副刊”。文學革命後不久，《新青年》這種綜合性雜誌，還有《小說月報》這種商業性文藝刊物也取得了很大成功。當時的北京由兩萬余名學生、教師、新聞工作者和中上層機關工作人員形成的知識階層，也正是報紙的讀者階層。每家報紙發行數量不等，如《晨報》1922 年發行量是七千份，到 1925 年增長為一萬份，《京報》最初三千份，後來增加到六千份。辛亥革命以後，政權的變更並沒有立刻讓中國走向民主革命的現代化道路，本質意義的現代化實質是社會各個部門各種機制逐漸裂變的結果。清末中國的教育、文化制度逐漸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發現了以大學為主體的高等教育機構，女大學生出現，新興知識份子進入社會公共空間，並積極介入到國家民族的發展進程中去，民辦新聞出版業迅猛發展，白話文大力推行，用白話文編撰的教科書和報刊雜誌得到推行和傳播，中國的民族國家想像，和西方文化密不可分。“中國從傳統帝國向現代國家轉型的歷史進程，卻同樣與肇始于西方的現代性與全球化密不可分。”¹⁶ 從涓生的精神資源來看，基本來自於西方文化。談戀愛的時候，涓生對子君啟蒙和規訓的精神資源是西方文學“破屋裏便慢慢充滿了我的語聲，談家庭專職，談打破舊習慣，談男女平等，談易蔔生，談泰戈爾，談雪萊……”；涓生失業之後，他作為自由職業者選擇的謀生方式是為《自由之友》翻譯；想要和子君分

¹⁶吳曉東：《文學的詩性之燈》，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 年第 52 頁。

手的時候，涓生依靠的依然是西方的精神資源：“我和她閒談，故意地引起我們的往事，提到文藝，於是涉及外國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諾拉》，《海的女人》。稱揚諾拉的果決……”最能體現西方文化影響的，是涓生的在慌亂和熱烈中進行的求婚，後來涓生表示“我已經記不清那時怎樣地將我純真熱烈的愛表示給她。”涓生在求婚前十幾天就仔細研究過自己如何表白，如何措辭，甚至遭到拒絕以後要怎麼辦，可是在求婚的當下，卻頭腦一片空白，慌張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電影上見過的方法了”。這一點是頗有意義的，“西方社會學家哈貝馬斯曾經指出，現代市民社會的建立有賴於公共領域的形成，公共領域的形成有賴於報紙、小說等印刷媒體的發達。後者之所以有如此功用，就在於其可以通過多種敘事締造一個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此共同體因其聚攏了民眾共同的時空想象而使大家感覺好像生活在一個共同的時空體中，享有共同的日常生活。”¹⁷ 慌亂時刻主宰人行為的往往是潛意識，採用了西方式的單膝跪地，可見在涓生的想像中西方文化已經具有了壓倒性的地位，甚至深入到了潛意識層面，這正是民眾的日常生活想像共同體在涓生求婚事件上的潛在表現。

三、“新人”為何難以誕生？

¹⁷谷鵬飛、趙琴：《美學與現代性問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4頁。

如果說當代世界的基本政治單位“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的話，在《傷逝》中我們體會到這種被民族國家的想像召喚而出的力量，雖然這一召喚是模糊的，甚至是互文性質的，它和那些西方的雪萊、易蔔生等一起，共同建構起一個孤獨的自我，這個自我開始感受到“寂靜和空虛”，從集體主義的傳統陰影中沖決出來，渴望用個性解放和愛情革命的方式走向新生，當這一嘗試失敗之時，不是就此停下腳步，而是用民族國家的想像呼喚自己繼續走下去，劉禾認為“如果說中國現代文學破土而出，成為這一時期一個重要事件，那麼這與其說是因為小說、詩歌以及其他文學形式是自我表現的透明工具，忠實地記錄了歷史的脈搏，不如說是因為閱讀、書寫以及其他的文學實踐，在中國的民族建設及其關於“現代人”想像的/幻想的(imaginary/imaginative)建構過程中，被視為一種強有力的中介(segents)”¹⁸《傷逝》也是一種破土而出的象徵，這部小說寫出了“新人”的掙扎與艱難。

在這個民族國家尚屬雛形，生活於早期市民社會的涓生和子君，作為“新人”，他們最大的特點是什麼呢？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他們的邊緣和孤獨。芝加哥學派認為“邊緣人就是生活在兩個世界之間，又不屬於容器中任何一個世界的人。”但是，作為“集團以外的人”，他們反而“具有某些優勢，如在理解集團及其行為方面具有客觀性和確定性，”而且作為創新者，正以為他們“與他們的系統相對來說不成一體，”¹⁹涓生和子君都不屬於北京這個城市，小說沒有交代涓生來自哪裏，但他寄住在紹興會館，這是一個外來漂泊者的身份。子君同樣是個“邊緣

¹⁸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宋偉傑等著，三聯書店，2002年第3頁。

¹⁹[美國]羅傑斯著：《傳播學史》，殷曉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第190頁。

者”，小說中她寄住在叔子家，離開了父親的家，而她死後的知情人透露子君家大約住在鄉下。來到北京，涓生和子君也無法融入這個城市，涓生工作是一個整日在局裏抄寫的小公務員，而他可以尋找的工作有抄寫、教讀、譯書、寫稿，小說中涓生沒有什麼朋友，也沒有親人。和子君關係惡化後，他無處可去，只好逃到通俗圖書館，在這裏都是陌生人，涓生也害怕看到熟人輕蔑的表情。涓生也曾訪問過熟人，但這些熟人的家是溫暖的，神情卻讓涓生在骨髓中覺得寒冽。同樣，子君也是孤獨的，她先衝破了家庭的束縛，離開了自己的原生家庭，來到叔叔家，而叔叔很明顯對子君和涓生的交往是反對的。“我便要取了帽子去看她，然而她的胞叔就曾經當面罵過我。”“她在她叔子的家裏大約並未受氣”“和她的叔子，她早經鬧開，至於使他氣憤到不再認她做侄女；我也陸續和幾個自以為忠告，其實是替我膽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絕了交。”以至於在婚後的生活中，子君最大的精神慰藉是阿隨，最重要的外交活動是和房東“官太太”“暗戰”小油雞的伙食。涓生在小說灰暗的底色中唯一感覺到“生氣”，想到新的生路的是在《自由之友》上刊發了小品文，他困頓的時候願意枯坐的地方是圖書館，他在和子君分手的時候想到是外面的廣闊世界，作為一個“外來者”，一個城市和鄉村之間的邊緣人，涓生一直無法進入政治和革命的中心，雖然這個一直是他新生的路的方嚮。

《傷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從私人的家庭空間走向了社會的公共空間，在這個生活空間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生活政治”是民族國家視野裏的一代新人面臨的重要課題。在晚清以來，對於女性的身份定位和理想建構也是“生活政治”、“現代性理念”的一個重要部分，魯迅的《傷逝》、演講《娜拉出走會怎樣》就是對易蔔生的《傀儡家庭》中娜拉出走的持續討論。對於子君來說，她從私人的家庭空間走向社會公共空間，結束了傳統時代的女性相夫教子的模式，她首先要面臨的是樹立

新的身份的問題。加拿大社會學家查理斯·泰勒認為，現代人“生活政治”的核心內容就是“自我”如何被“他人”所承認。²⁰如何在公共社會生活中確立自己的身份，如何尋找到自己在新時代的位置，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正如歐美女權主義者也探討到的：“對於被解放的婦女來說，認同便成了最為突出的問題”，因為傳統“婦女的認同完全是依照家和家庭來界定的。”²¹五四初期的子君的新的身份應該是什麼，同居之後她是應該如涓生所願繼續“讀書”和“散步”，還是承擔繁重的家庭勞動？如果家庭勞動和經濟收入得不到社會保障，女性的解放是否就是一種虛妄？在家庭財產關係上，雖然同居時子君變賣了自己的金戒指和耳環以加入家庭的股份，但社會沒有提供給子君一份合適的工作，這種家庭經濟關係是否能夠保持穩定？更重要的是，子君具不具備獨立的條件和地位？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凱琳·薩克斯認為：“階級社會中婦女的從屬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家庭財產關係造成的，而是婦女沒有社會性成人的地位造成的。”“公共社會勞動是社會性成人身份的物質基礎。”²²涓生和子君之間的隔膜，根本在於涓生和子君在國民國家視野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愛情，對於涓生來說，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但卻不是全部，從某種意義上講，涓生更是要借助愛情逃離“寂靜和空虛”。而對於子君來說，愛情就是她要追求的全部，所以在同居以後，她全部的努力都是侍奉涓生，維持這個家庭的正常運轉，當兩人走向隔膜的時候，她似乎並沒有明白兩人關係的裂縫是追求的目標不同而導致的，直到離開的時候，她依然把全部生活材料留給了涓

²⁰劉維公：《布迪厄與生活風格社會學研究：兼論現代社會中的社會學危機》，《社會理論學報》，1999年第1期，第347-371頁。

²¹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趙旭東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261-265頁。

²²凱琳·薩克斯：《重新解讀恩格斯——婦女、生產組織和私有制》，《社會性別研究選譯》，三聯書店，1998年第15頁。

生，這是她對這場愛情全部的獻祭，從始至終沒有改變。這就是涓生和子君愛情和啟蒙觀念的錯位。子君認為革命的目的就是愛情，她是把革命和愛情劃等號的，涓生的訴求是啟蒙，愛情只是去往啟蒙的一個條件，不是全部。歸根結底，“新人”的生活政治的改變還是要依賴於社會革命的改革。

四、《傷逝》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思

金理在《造人·“偽士”·日常生活——重讀傷逝，兼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意義》中把《傷逝》理解為“五四啟蒙之父對‘啟蒙’的反思，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造人’神話的反省、‘偽士’批判的形象化書寫、日常生活的辯證法。”²³這一研究可以說是《傷逝》近幾年研究中的代表性成果，在論文中，研究者以“造人”為隱喻，認為涓生創造了子君這樣的新生主體，從而把涓生等同於“啟蒙者”、“造物主”的位置，但是這個“造人”的神話被自身消解了，從而進一步被研究者定義為“偽士”，認為《傷逝》是“五四啟蒙之父對‘啟蒙’未經合法化的深刻質疑。”²⁴這當然是一個理解啟蒙文本的途徑，但是如果仔細辨析《傷逝》文本，特別是後半部分涓生懺悔與辯護中交織的迷茫與反思，就會發現，涓生和子君在“新人”的本質上都是一樣的，在現代民族國家發生的過程中，他們都是迷茫者，涓生在嘗試用思想啟蒙的方式尋找新的生路，子君則身體力行用生活啟蒙的方式追尋涓生，他們的失敗不在於啟蒙本身的問題，而是當時的民族國家並沒有完全

²³金理：《造人·“偽士”·日常生活——重讀傷逝，兼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意義》，《南方文壇》，2015年第5期。

²⁴金理：《造人·“偽士”·日常生活——重讀傷逝，兼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意義》，《南方文壇》，2015年第5期。

準備好迎接這批新人的到來。對《傷逝》的解讀如果從“中國視野”式的思想啟蒙中跳脫出來，轉向“民族國家”，就會發現《傷逝》同時還在描寫一個從東方走向世界的知識份子的心靈史。他在西方的知識背景下試圖啟蒙一個東方式的女性，目的不是為了愛情，而是為了“新的生路”，當然由於子君的傳統婚姻觀和現實社會機制的不健全，這段愛情失敗了，子君也逝世了，但追尋者涓生並沒有停下走向生路的腳步，即使他身上依然背負着道德的重負，但這一切均可視為我們走向世界必須付出的代價。

費孝通指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在近百年來中國和列強中產生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來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²⁵20世紀初，在殘酷的民族危機背景下，受西方現代民族理論的刺激，中國知識份子的提倡下，“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提出並迅速為社會各群體接受。“民族”這一詞語來自日文詞彙，最早使用“民族”一詞的是梁啟超，他在1899年的論文《東籍月旦》中從日文引用了這一詞彙，1902年的《中國學術思想之變遷之大勢》中，梁啟超使用了“中華民族”說法，並在使用中逐漸向着民族國家共同體的現代意義靠攏。孫中山的“五族共和”，李大釗的“新中華民族”都與此有着緊密的關係。西方的現代“民族”概念，是在工業化發達和公民市民社會興起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工業市場和公民社會。而“中華民族”的產生，則是為了抵抗“他者”、“西方”和“世界”的入侵。

在振興中華民族的過程中，從晚清以來，不同的知識精英採用了不同的方式提出自己的主張。洋務派認為落後來自於技術，所以要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模式來重塑自我，維新派、革命派認為傳統的帝制對自我發

²⁵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頁。

展造成了障礙，因為希望以西方政體為參照，通過政體改革復興民族。五四知識份子，嘗試通過思想革命來重建新的“中華民族”，“國民性”理論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下引進，但是“國民性”“提出提升了自我的主體性，更能迎合民族發展的需求。文學對民族意識進行回應的同時，也在進行着越界和發問，文學寫作也加入了現代民族國家共同體的建構。

從鴉片戰爭到新文化運動興起，這一時期的民族書寫充滿了批判和自卑，在現代西方的參照下，東方顯得更加積重難返。陳天華《獅子吼》、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劉鶚《老殘遊記》、《孽海花》都觸及了晚清民族的複雜面貌和未來中國的想像。1915年，圍繞在《新青年》周圍的現代知識份子群體，發起了對傳統文化的猛烈抨擊，1917年開始的文學革命更是將這一潮流擴展到了文學領域，《新青年》祭出的是“德先生”、“賽先生”的西方民主、科學的大旗，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中認為歐洲是“莊嚴燦爛之歐洲”，和中華民族則是“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莫不黑幕層張，垢汙深積”。在五四時期的創作中，“西方”成為一個看似不在場的在場者，五四摻雜着英文、德國、日本等不同語言的表達習慣，價值標準的西方化，對自我的懷疑和否定，在日常生活中走向現代民族國家的彷徨和無力，“新人”強烈的沖決的勇氣和現實的四處碰壁都顯示出“新人”誕生的艱難，其實不是思想革命本身的桎梏，而是整個社會結構的問題。在魯迅小說中描繪了知識份子“新人”誕生的譜系，《狂人日記》通過文言的小序和白話的正文形成一種沖決和回歸的結構，民族國家架構中的“新人”蘇醒了，但他的生活還沒有落到實處，僅僅是意識層面的蘇醒；《在酒樓上》“我”向頹唐的呂緯甫告別，向相反的方向走去，但“屋宇和街道都織在密雪的純白而不定

的羅網裏”²⁶；《孤獨者》寫了知識份子魏連殳試圖構建新的家國想像的努力和失敗，從死亡開始，以死亡結束，黑暗與虛無乃為知識份子的實有，但是“我的心地就輕鬆起來，坦然地在潮濕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²⁷反抗絕望的向前的勢能中“新人”有了更堅定的勇氣，但前路在那裏，依然只是在虛妄的想像之中；一年以後寫作的《傷逝》更是在結尾的時候以遺忘和說謊給涓生留下了新的生路。“冰的針刺着我的靈魂，使我永遠苦於麻木的疼痛。生活的路還很多，我也還沒有忘卻翅子的扇動，我想。——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責，懺悔了。”小說的後半段陷入到深刻的靈魂自辯和意義的糾纏中，虛妄的意義和現實的沉重，變成“虛空的重擔”，重壓着涓生和涓生想像中的子君——兩位試圖走向新生卻無法邁開腳步的兩位“新人”。這不僅是《傷逝》的宿命，也是 20 世紀中國現代文學一再書寫的宿命。

魯迅對於“新人”的誕生與思考，既是一個時間概念，又是一個空間概念，既是對“老中國兒女們”的國民性層面的精神追討，同時也是放在全球空間中正在變動中的城市社會中的“新人”的精神隱患。一方面是“新人”在歷史中的位置，另一方面是“新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正如魯迅所言，現在是“進向大時代的時代”²⁸五四時期，在民族國家體系建構的過程中，文學最大限度地參與了時代的建構，魯迅在“立人”為本的基點上，反復在《狂人日記》、《傷逝》、《孤獨者》、《在酒樓上》等文本中建構“新人”形象，就是以現代個人為中心的思路的文學圖景，在此基礎上，覺醒的個人要建立“人的國”，這個“國”是現代性的產物，“外之既不

²⁶魯迅：《在酒樓上》，《魯迅全集》（第 2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第 34 頁。

²⁷魯迅：《孤獨者》，《魯迅全集》（第 2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第 110 頁。

²⁸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 8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第 27 頁。

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²⁹，從而在世界語境中建立起獨立的國族形象。從本質上講，魯迅發出的“五四”的聲音實質是在與世界對話，而並不僅僅是涓生一個人的靈魂鬥爭。五四作為一個反傳統的思想浪潮，“民主科學”、“個性解放”、“文學革命”等口氣旗幟鮮明地在時間上定義了五四的現代性，但同時，從世界性的空間格局考察《傷逝》等文本，也是在提示我們，“五四”啟蒙者們並非在文明的內部批判和自我否定，而是在空間格局上以世界為背景開始反思，其對傳統的反叛與拒斥，背後有着西方文化的強烈影響，堅定地去往“新的生路”的涓生們即使曾經舉棋不定、批判自我，他們還是願意犧牲自我和日常空間的代價，探索民族的新生之路。對西方文化如何融入本土的反思，對建立現代民族國家道路的理性思考，則是五四時期還沒有能力解決，但魯迅已經敏感意識到的問題。

²⁹魯迅：《文化偏至論》，《河南》第7號，1908年8月5日。